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



- 张道惠 布莱恩 编辑
- 张道惠 布莱恩 柏格理 邝慕廉 王树德 等著
- 东人达 翻译 注释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



张道惠 布莱恩 编辑

张道惠 布莱恩 柏格理 邝慕廉 王树德 等著

东人达 翻译 注释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东人达注译.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367 - 5014 - 2

I. ①西… II. ①东… III. ①基督教—传教士—史料—西南地区—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9341 号

责任编辑	王时炜
封面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0 001 ~ 2 500
定 价	38.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367 - 5014 - 2/K · 1347

The Rev. Harry and Mrs Annie Parsons

Rev. Harry Parsons Miss Annie Bryant Rev. William Tremberth Rev. C. Hedford

Rev. Frank J. Dymond Rev. Samuel Pollard Mrs. Balkwill Rev. A. J. Nicholls

Rev. C. N. Mylne Rev. L. Savin Rev. C. E. Hicks Rev. A. Evans Mrs. Knight

Rev. J. A. Dolson Rev. E. R. Craddock Mrs. J. A. Dolson Rev. T. H. Darlow

Mrs. F. R. Craddock Rev. W. H. Hudspeth Auntie Dot Nurse N. B. Raine

Miss Barwick Rev. R. H. Parsons Rev. P. H. Parsons

译者前言

在云南、贵州、四川毗邻的广大地域内，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洞开了基督宗教向我国西南传播的大门。基督教新教的循道公会与中华内地会，在西南各民族中的影响最大。循道公会以云南为基地，沿昆明、东川、昭通一线扩展，并进而向黔西北、川南渗透。由于循道公会的人力不足，就把以武定洒普山为中心的区域交由内地会经营。

1904年，经由内地会驻贵州安顺的传教士党居仁，把长途来访的威宁州的苗族人，介绍给云南昭通的圣经基督教教会即后来的循道公会联合会传教士柏格理，由此引发了滇、黔、川边各少数民族的基督教运动，被苗族群众称为“龙年得道”。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中的重大事件，产生了广泛影响。最早皈依的苗族成为“引领”民族，彝、傈僳、怒、景颇、拉祜、傣等民族随后跟上，形成近现代基督教在西南的基本布局。内地会传教士艾萨克·佩奇称这种突破，起到了让全中国外籍传教人员“几为一振”的功效。“十五年前，基督教在苗人中布道颇有功效。当时全国宣教师几为一振，然此中实有圣灵之助力，潜移默化于无形，更加以积年经营不懈之工作，始克臻此，非‘造作’所可成功，一人所能奏效也。其间或有怀疑观望者，以为各种工作实难告捷。不知即有如亚当（Adam）及柏格理（Pollard）二人，抱大志，具远识，孑身独往，穷年布道，恃上帝之助力而功

效立见，其工作始于安顺，推广及威宁而入云南，即今日彝家族中之布道运动亦莫不以是为导线。苗人入教者已逾万人，注意神道者更不可以数计”^①。

位于滇、黔、川边多民族聚居区域的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石门坎，很快就成为基督教循道公会的宗教与文化中心。因为这里是苗族的聚居地，所以又被称之为近代“苗族文化复兴的圣地”、“苗族文化最高区”。

近年来的相关著述与译著，如《“窄门”前的石门坎》、《在未知的中国》、《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等，对于这段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归纳，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重现研究客体的历史原型、人物、活动、场景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空缺，而本命题即《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则起到了填补部分缺憾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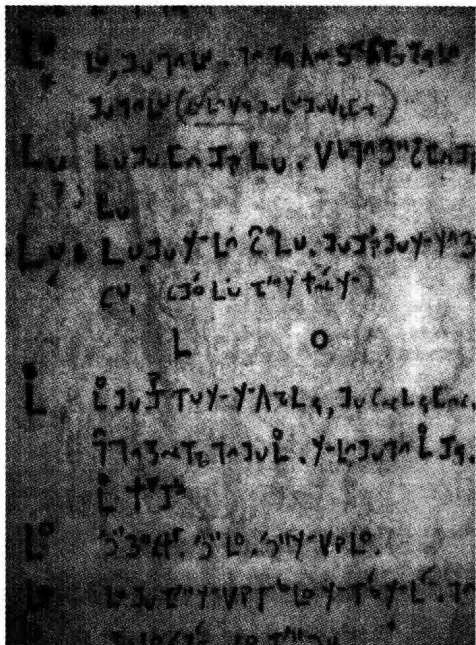
这些珍贵的资料，是由当年与柏格理一同苦心营建石门坎宗教与教育中心的张道惠牧师（Rev. Harry Parsons）夫妇的孪生子张绍乔（Rev. R. K. Parsons）与张继乔（Rev. P. K. Parsons）搜集得来。他们出生并生长于石门坎，回英国接受教育，完成学业后，旋即返回中国西南，在云南、贵州的民族区域从事布道与教育活动。张绍乔、张继乔兄弟于新中国成立后即回国，长期参与苗族史诗和古歌的搜集、记录与整理，并成功地研制开发出老苗文文字课件。在本书资料的搜集过程中，甘铎理先生（Rev. R. Elliott Kendall）的女儿艾莉森·刘易丝（R. Alison lewis）教授从中进行了有效协助。

这些档案性资料包括由以张道惠牧师夫妇为主的30名作者所撰写的117篇纪实性文章组成，这些文章共约20万字。发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华归主》（上），1985年，第376页。

于1902~1906年的《圣经基督教教会杂志》和1908~1927年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回声》之上。由于这两份杂志发行量很少，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岁月，现在已经成为孤本，只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因此译者称这项编译工作为“档案揭秘”。

这些纪实性的历史文献，成为我们了解、研究基督教在滇、黔、川民族地区传播的整个历史过程，包括各民族教会与生俱来的本色特征，以及近



张绍乔与张继乔的苗文手稿

现代西南苗族、彝族等民族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因为作者中有多位外籍女传教士，就从特定的性别角度展示了基督教教会的妇女儿童工作，介绍了各民族妇女的经济生活与习俗，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一处空缺。除了对于基督教运动的过程性介绍外，本书还详尽描述了以寻甸、东川、会泽为中心区域的彝族葛泼支系的情况，这在以往的著述中是没有的。

例如：滇、黔、川少数民族基督教运动的本色特征。

1. 苗族传统花山节活动的演变

作为滇、黔、川边少数民族基督教运动的开启者，柏格理对于苗族传统文化很早就抱有一种难得的理解与欣赏态度。他在1892年的日记中，即有两相关则记载：“4月1日，今天，看到

教士身着苗族传统服装，吹奏着芦笙，与早期苗族寻访者合影的照片^①。由此表明了柏格理等传教士对于苗族传统文化的基本认可，后来又有张绍乔、张继乔等对于苗族古歌的记录与整理，而在中国流传的所谓循道公会传教士禁止芦笙与苗歌，应是不可信的。

原载于 1905 年 10 月《圣经基督教杂志》上张道惠的“将异教的节日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盛会：与苗族人在一起的兴奋日子”，以及以后的系列报道，说明柏格理、张道惠等传教士，如何在农历五月初五苗族传统的“花山节”进行活动的情况。这一改革，用教会人士的话，是将异教节日变成了基督徒的盛会。

但就另一种视角出发，可以说，花山节是滇、黔、川边苗族群众流传了上千年的节庆活动，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空间。对此，采取保留与尊重的态度，则教会昌；采取禁止与鄙视的态度，则教会亡。

在石门坎由教会主办的五月端午的节庆活动中，时间仍是传统举行花山节的日期，参加者仍是苗族群众，苗家的花衣、语言仍在，饮酒、情歌不见了，但增加了射弩、爬杆、穿针、绩麻等源于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比赛项目。歌是要唱的，不过内容变为了赞美歌。从某种意义来看，新办的端午节更好地起到了团结、认同与凝聚族群的作用。从基督教在中国西南播散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可谓是西方宗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教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保证。

与循道公会的做法相反，早在 1899 年就到贵州省普定县等堆创办苗族教会，并把苗族寻访者介绍给循道公会传教团的中华内地会传教士居仁，虽然在初期曾被群众称之为“苗王”，却对苗族传统文化采取了敌视和否定的态度。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

① Sam Pollard, *The Story of the Miao*, London: Henry Hooks, 1919. 33.

性，党居仁无法理解历史悠久与内涵丰富的苗族传统文化，反倒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去衡量这份人类文化遗产。他认为苗族的故乡传说、怀念祖先的敬祭方式是伤风败俗的陈规陋习，苗族的传统节日跳花、跳场以及男女青年自由恋爱是淫荡之风，而苗族的传统乐器芦笙、二胡、唢呐、口弦及妇女佩戴的装饰品等是淫荡之物，主观判定凡此种都不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属于应禁止之列。

1910年，在党居仁的倡导下，成立了“苗族改良会”，并公布《等堆基督教苗族改良会章程》，宣言：不许苗族跳花场、不许自由恋爱结婚等。《章程》公布后，布道员杨庆安带人到安顺北门外和东门庄，禁止苗族跳花山。为此，东门庄的苗族王兴龙、王和顺兄弟两人，与杨庆安共同去安顺教会找党居仁论理。王氏兄弟说：我们苗家自古说“苗家不跳花，谷子不扬花”，你们信教人不许苗家跳花，请问你们要不要吃饭？党居仁见群众反对情绪强烈，只好让步^①。

改良会的主张，大致上反映了滇、黔、川内地会对待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他们无视长期的阶级与民族压迫导致各民族人民苦难的历史事实，反倒将少数民族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于民族传统文化。在经济状况没有改善，社会地位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企图逼迫群众放弃赖以维系本民族族群和社会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放弃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就势必导致群起而反对。这种态度，导致了相当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始终对基督教的坚决抵制，也成为内地会教会在已经信教的民族地区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① 杨朝文.《基督教内地会在安顺、普定苗族地区影响的调查》，岑秀文、杨昌文编.《贵州省民族志资料汇编第二辑（苗族）》，贵州省民族志编委会1986年，第297~298页。

2. 民族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教义

除了前面谈到的主体与形式外，在基督教信仰与各民族的传统意识方面，传教士也要做出调适，甚至是让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二者的和谐相处。可以说，这是基督教本土化的深层次问题，也是民族教会本色特征形成的根源。

从《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中的资料反映出，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们在内心中还固守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当基督教教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有的教徒就会采取倾向于民族文化的立场。

原载于1910年《传教士回声》第166~171页的张道惠的“一次在苗疆的旅行”中，记载下这样一则趣事：“几个人作为《圣经》的导读者，在晚礼拜上介绍了他们的体会。其中一个是以苗族古歌的传说反驳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说桄老和坎姑娘（音译人名——译者）才是最早产生的两个人；他们原本生活在与昭通邻近的地方，以卖盐巴为生等等。”可见，这些信徒更相信苗族史诗，并据此对《旧约圣经·创世纪》提出质疑。

西南彝族的各个分支，都相信先秦洪水泛滥时期的六祖分支的史传，都认定六族分支时期的先民首领笃慕（即仲牟由、祝明、居木等）为共同的先祖。当传教士了解到云南彝族葛泼支系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仰之后，也只好牵强地暗示笃慕就是耶稣基督。原载于1915年《传教士回声》第136~138页的张道惠的“云南的葛泼人（续）”记述，葛泼人“祖先的牌位，从汉人那里学来的习俗，已经被普遍地供奉在家中，而用纸、木、石料制成的偶像，似乎不再经常祭奠。树木，单棵的和丛林，已经被神圣化，据说鬼魂可以栖身其中，因此需要定期献祭；各种牲畜与家禽都被用于此项目的。这是一种令所有人感到恐惧的宗教，一种看不到将来希望的生活方式，一种游荡在人们周围的几乎可以

感知的黑暗。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认一位至高的、全能的与永存的神，他们称他为雅索慕（音译，疑为指彝族六祖分支时的先民首领笃慕——译者）。他们如何对他进行崇拜，我们尚无法确定。我们要引用保罗的话，对葛泼人说：‘当我走过的时候，注意到了你们的热心，我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崇拜着的神’。

3. 各民族教会的自立精神

在滇、黔、川边多民族分布的广大地域内，循道公会传教团经营的地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东北与黔西北各民族、滇中与滇北各民族、川南苗族地区。在各民族教会创办与经营的过程中，各族群众都主动承担起财力、物力、人力及土地的供给，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自立精神，可谓是本色特征的突出表现。

原载于1905年10月《圣经基督教杂志》的张道惠的《将异教的节日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盛会：与苗族人在一起的兴奋日子》，记载了石门坎中心的创建情况：“柏格理先生已经获得了一份礼物，一片足够建设一些房子的宽阔的土地，而且，就以我的尽可能判断，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需求，长达若干年，并且是在许多方面的。人们渴望有学校、老师的住房和小教堂，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但是毅然决定，每个人自愿捐献出100文钱，目前已经征集到了数万枚现钱，可以建设一座较大的学校（同时还用于建设一座小教堂），能够坐下500个人的，以及四五间供本地人、老师、寄宿学生居住的房子，还有三间临时性的传教士住房，这些都正在施工之中。”

这则记载，与柏格理的《苗族纪实》、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等其他国内外文献一同印证了同样的史实；即创建石门坎中心所使用的60多亩土地，是由彝族土目安荣之捐赠；所使

用的经费，为广大贫苦的苗族会众所自愿捐献；伐木、备料及施工的劳力，都为教会信徒所义务承担。在初创时期，循道公会传教团在是否向山里的少数民族开拓传教事务方面还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传教团并没有此项业务与经费。这种情况，更加激发了苗族、彝族会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教堂与学校的精神。

西南各民族在教会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自立精神，还表现在本地布道员、教师、《圣经》导读者及宗教读物书贩所发挥的作用上。柏格理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深有所感地评价：“所谓在中国的成功的传教士的很高的荣誉给予了外国传教士们。现在却应该意识到，如果没有当地传教士的帮助，许多一直在进行的事务将永远不会被展开。在苗族运动初期，当时我没有一位固定的英国同事的帮助，多亏一些汉族基督徒英雄般的工作，若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有时会出些差错，他们的看法也经常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确应该受到我们深深的感激。”^①

当然，在本土的布道员中，就人员数量与发挥的作用来说，还是当推苗族人士为大。1904年柏格理只是带领数名汉族教徒来到乡下多民族山区，几年之内，苗族教徒激增，经过不断选拔、培养，本土各民族的布道员、教师很快变为数十名、数百名。这些中国的布道人员，先是创建了石门坎及周边区域的宗教与教育中心，然后向云南府即昆明与川南扩展，影响到当时的几十个州县。循道公会于20世纪20年代将以武定洒普山为中心的滇北一带移交给中华内地会经营，并长期由石门坎派出苗族布道员与教师帮助管理。这些情况，在《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的不少章节中都有记载。

① 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第131页。

由于循道公会传教团的人手本来就十分紧张，对于昭通与石门坎周边的传教站点，还能坚持进行巡视与指导，而对滇北与川南的两个部分，就更加鞭长莫及了。这样，必须完全依靠当地教会人士。这种形势，就更加促使这些教会向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原载于1914年《传教士回声》第241~243页的张道惠的《一位花苗人杨芝》，专门记载了从石门坎走出来的苗族布道员、老师与《圣经》导读者杨芝，他在滇北独当一面地工作了多年。“这是上万个葛泼人衷心欢迎与高度尊重的一位男子，荣誉来自他担任‘老师’光荣称号的任期。当我们看到并评价他的工作时，不禁大声喊：‘上帝做了什么？’这是一个被他人轻视的苗族人。比起受命前去服务的人群，他的社会等级低下，身体柔弱，但是却为他们所接受，并成为他们公认的精神领袖。如果对某个行动过程有疑问，那就‘问一问杨老师’，以及‘杨老师说……’这就是决定性的话语”。

原载于1917年《传教士回声》第23~25页的张道惠的《葛泼地域的八周巡礼》，记载了当地彝族人捐资办学与建立小教堂的情况。例如，对学校的慷慨支持：“为学校提供的支持慷慨大方。将近700户家庭响应号召，自愿被征收一个半开（辛亥革命后云南流通的一种银元——译者），以解决在葛泼人中学的日常开支。其中许多人并没有男孩或女孩在学校读书，因此期待他们捐助别人孩子的教育可谓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种阅历，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因此，进而激发出此前从未见到过的对于学校工作的一种兴趣。做出捐助的人家现在显示出了个人的形象，而从前仅仅为一种抽象的兴趣。”又如，自建小教堂的进展：“小教堂的建设在进展。为新教堂的9个选址已经被确定。‘老师，我们将在哪里建教堂？’‘您只要指出最适合的地点，我们就会把教堂竖立起来’。这是一个又一个村寨的请求。

这些建筑中的绝大多数马上就会建立起来——营建费用全部由原住民支付。当这些小教堂竣工之后，葛泼人将拥有近三打（36所——译者）的教堂——在过去的三年中平均每个月增加了一座新的，并且没有遗留任何债务。”

原载于1919年《传教士回声》第153~155页的T. H. 达洛的《在水苗之中》，较为详尽地介绍了1918年从石门坎派出的三位花苗基督徒在川南开拓宣教事务的情况。原载于1923年《传教士回声》第21~23页的王树德的《开启‘李子寨’的小教堂》，是讲述王树德代表传教团，应邀去开启一座新落成的小教堂，但是赶到那里之后，“令我们十分惊愕的是小教堂并没有完工。我们一路走下来去开启一座新的，按照我们的想法，是一座完整的小教堂，但是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不同于西方思想的东方思维模式。小教堂的框架结构已经竖起，而屋顶的铺设已经完成，只是不见任何墙壁的踪影。原来是当地的砖石工，而且是周边一带唯一的砖石工，因为他对自己的劳动提出了过高的要价，于是苗族人决定放下墙壁的建筑，一直等到收获季节之后，那时劳工的价格将比较便宜。”由此可知，传教士是在任由当地人自主左右教会的一应事务。

又如：基督教的妇幼宣教事业。

《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资料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于传教士妇女工作者和基督教教会妇幼工作的记述。在循道公会联合会派出的女性传教士中，有以“妇女的帮助者”为名称的专门人员，她们都是英国妇女联合会的成员，从事妇幼方面的宣教、救助事务。这种组织体例，在近代西南基督宗教的其他派别中，是很独特的。

在全书有关妇幼内容的文章中，有以“妇女的帮助者”为题的文章8篇，女性传教士的文章11篇，还有“孩子专页”3篇。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

女性对于当时中国的观感；二是她们在中国从业的艰辛；三为她们所从事的妇幼宣教事务。

1. 外国女性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观感

鸦片战争后英国传教士来中国西南的最初路线，先是从英伦三岛搭乘远洋客轮抵达上海，再由上海乘轮船沿扬子江即长江西行到湖北宜昌，这是当时轮船航行的极点。因此从宜昌开始，就需要换乘木船，通过长江三峡，到达重庆；而再往西，就有两种方式：一是取陆路到云南东北部的昭通；二是乘小船上行到木船可以到达的极点云南水富，再由水富取陆路南行到昭通。因此，凡是初次来华的传教士，无不留下了对于长江三峡美景与西南秀丽山川的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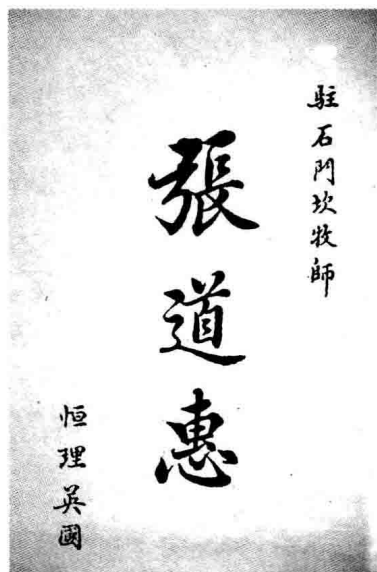
而在赞美东方秀丽景色的同时，西方女性传教士也开始以特有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地位与生活。

例如，布莱恩女士于1906年刚到中国时，即发出“对妇女联合会的一项呼吁”，这篇资料原载于1906年《圣经基督教杂志》第115~119页。在文章中首先讲道，她在重庆合川的传教点中，看到“下午又有50名妇女参加，儿童就在旁边。当皮瑞夫人宣讲的时候，她们非常虔诚、非常认真地听讲。我察觉到，这些妇女从来就没有听过一位与她们自己相同性别的人解读《圣经》，也就意味着她们对于教义所知甚少。奇异！几乎有100个灵魂渴望着基督，如同追随他的白人妇女一样宝贵，只是她们还从来没有被教之以他的爱。噢！如果家乡我们自己的姊妹能够看到一半我在受难的中国目睹的这里姊妹们所处的黑暗！如果仅仅可以看到礼拜结束后当地众妇女紧贴在皮瑞夫人周围，直到她告诉她们的关于耶稣的声音渐渐远去！如此一种情境将促使我们女传教士联合会的成员产生什么样的灵感；她们如何能够否认自己可以促使这些贫穷的妇女一年至少听到一次福音！希望英国女性意识到我们对于基督教尚有亏欠，只有我们少数人可以坐享

‘锡安山的舒适’，同时我们如此多的姐妹正在承受着那么多的异教黑暗的苦难”。她还记下了由重庆前往昭通途中的一则见闻：“早饭之前走出 10 里，来到一家普通的茶馆。在茶馆里我非常伤感地见到一名姑娘，看上去只有 14 岁，她已经是一位妻子和母亲。看着她时我产生了一种感恩的心情，非常感谢有国内那么多的女士们正在为中国遭受苦难的妇女和姑娘祈祷与工作”。

2. 西方女性传教士在中国期间所经历过的艰辛

西南传教士所服务的区域，大多属于高海拔的云贵高原，他们放弃了西方社会优裕的生活，来到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就要时常面对疾病与死亡的考验。在我们所知的事例中，柏格理、王树德患过伤寒，邰慕廉染过天花，张道惠夫妇是风湿病，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被传染过疟疾。



张道惠名片

就体质较差的女传教士而言，罹患疾病就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例如，布莱恩女士于 1904 年刚到中国，沿长江而上时，就感染了天花，不得不停留在宜昌，长期养病。又如，原载于 1912 年《传教士回声》第 29 ~ 30 页的《海外秘书笔记》，记述了莉莲·格兰丁医生的病：“我们非常遗憾地听到格兰丁医生患有一种严重的疾病。有些天她的病情引起了极大的焦虑，不过张道惠牧师最近的一封信中说她的病况有所改善。伴随心脏病复杂化引起的发烧是导致麻烦的原因，

因此特别需要她改变所处的高海拔环境，以有利于恢复。格兰丁